

何广博 主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

# 述善集研究論集

段文傑題

述善集研究論集

# 《述善集》研究论集

何广博 主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述善集》研究论集/何广博主编.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1

ISBN 7-226-02503-5

I . 述 … II . 何 … III . ①述善集—研究 ②西夏(1038 ~ 1227)—史籍—研究 IV . K246.3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4736 号

### 述善集研究论集

何广博 主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00 兰州市滨河东路 296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甘肃·定西神力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25 字数 268 千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226—02503—5 K·430 定价:27.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 顾问

朱绍侯 白 滨

## 编委会主编

荷 广 博

## 编委会主任

刘 善 章

## 编 委

杨富学	刘巧云	孙德萱	毛海林	吴新普
王跃军	栾好民	梁臣朝	刘庶涛	郭奎立
翟 伟	吉庆印	郭克光	赵同法	张跃华
何立存	宋纪功	王 瑞	王洪波	刘洪浩
杨存藻	杨美贵	杨世峰	焦进文	

## 序一

西夏后裔濮阳唐兀杨氏珍藏600多年的祖遗藏书《述善集》，经焦进文、杨富学两位先生标点、注释，撰成《〈述善集〉校注》一书，将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与之同时，他们又协助何广博同志编成了《〈述善集〉研究论集》(以下简称《论集》)一书。前者是焦、杨二位的个人撰述，后者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述善集》是唐兀杨氏四世祖杨崇喜(唐兀崇喜)于元末所编辑的一部诗文集，原书分《善俗》、《育材》、《行实》3卷，约4万余字，主要是赞颂杨氏先人的祖德懿行，保存了西夏后裔唐兀氏迁居濮阳前后的完整历史资料，对研究西夏史、元明史、中华民族融合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述善集》在1986年以前，仅在唐兀杨氏家族内部流传，不肯轻易展示给外人。近年，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感召下，杨氏家族逐渐认识到，《述善集》不仅是唐兀杨氏的“传家宝”，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具有很高、很广泛的学术价值，愿意公之于众，供学者公开研究，从此才引起西夏史、宋元明史专家的重视，纷纷到濮阳调查访问，1999年4月还在濮阳县举行了一次小型学术研讨会，对《述善集》及《杨氏家谱》的学术价值及唐兀杨氏的族源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相继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10数篇研究《述善集》、《唐兀公碑》和河南濮阳西夏遗民的文章和报道。

为了总结这些年的研究成果，并进一步推动学术界对《述善集》及与之相关的元代西夏遗民的研究，在各方面的支持下，由何广博同志搜求各种报刊上发表的相关文章，择其要者，与1999年4月小型学术研讨会上提供的论文，汇于一帙，编成了这本卷帙不大

却富有参考价值的论文集。

该文集共收论文21篇。大致可分为三组：第一组专论《述善集》诸文献；第二组为濮阳西夏遗民研究；第三组则论述濮阳以外诸地元代的西夏遗民。

第一组包括论文6篇，分别为刘巧云《〈述善集〉学术价值刍议》、刘坤太《元代唐兀杨氏〈述善集·龙祠乡约〉的伦理学探析》，杨富学、焦进文合撰《元代西夏遗民〈龙祠乡约〉探析》、《元代哈刺鲁人伯颜宗道新史料》以及拙作《试论〈述善集〉的学术价值》与《〈述善集〉选注（二篇）》。该组论文数量虽然不多，但对《述善集》的重要文献价值多有阐发，且有一定深度。如刘巧云先生在该文中提出了“唐兀杨氏家族，多元一体的民族大家庭”这一命题，还指出，与党项羌族同时迁入濮阳的旭申氏、乃蛮氏、怯烈氏、哈刺鲁氏、蒙古朵烈团等，也都融入了汉民族之中，只是因为没有祖谱传世而未被社会所知，“它们都为中华传统文化做出了积极贡献，都为华夏民族输入了新鲜血液”，这些“民族将永远闪烁在历史的星空”。另外，文章高度评价了由两个少数民族创办的两所古代书院，说这“对研究少数民族教育发展史，更具文献价值”。文章还对忧国忧民与忠君爱国思想也作了分析，这也是一种独到的见解。

刘坤太教授的《元代唐兀杨氏〈述善集·龙祠乡约〉的伦理学探析》，从微观、宏观、历史三个角度，对《龙祠乡约》的伦理学价值进行了深入研究，阐述了《龙祠乡约》“善俗”的几种途径；从《龙祠乡约》看民间对“善俗”的社会认同；从《龙祠乡约》看民间社会伦理观念的发展。可以说是逐层深入地揭示了《龙祠乡约》的可贵伦理学价值。坤太同志赞颂《龙祠乡约》是我国民族大融合的一曲美妙乐章，填补了元代伦理学资料的一项空白。

杨富学、焦进文撰写的《元代西夏遗民〈龙祠乡约〉探析》则通过对该乡约与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另外两部乡约《蓝田吕氏乡约》和《南赣乡约》的比较研究，指出《龙祠乡约》贯穿着宋代张载、程朱与

元代许衡的理学思想，它直接脱胎于北宋吕大钧的《蓝田吕氏乡约》，但内容有较大的变更，表达方式也有相当程度的改变。这一乡约对西夏遗民的影响一直很大，在元末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明代王阳明《南赣乡约》的制定，承上启下，在中国伦理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第二组也有论文6篇，有任崇岳、穆朝庆合撰的《略谈河南省的西夏遗民》，罗矛昆、许生根合撰之《河南省濮阳地区西夏遗民调查》，王天顺撰《党项唐兀氏后裔徙居濮阳的时代背景及其家族在元代的社会地位》，李清凌撰《从〈述善集〉看河南濮阳西夏遗民的族属与汉化》及张迎胜撰写的论文二篇：《杨氏家族婚姻关系刍议——〈述善集〉窥见》和《家族文化的灿烂奇葩——杨氏家庭教育刍议》。张教授的前文根据《述善集·祖宗行实碑铭》的记录，对唐兀氏前四世的婚姻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最后得出结论说：唐兀氏在经历了极富特色的由“被征服者”到“征服者”的政治蜕变，以及由“游牧人”到“农耕人”的经济蜕变过程之后，凭借恰当的婚姻关系的选择，十分有效地拯救和创造了自己家族的命运，也正是这种追随时代步伐而选择的婚姻关系，使杨氏家族对族属不同、源流不同、性质不同、特色不同的文化，切实而能动性地整合和互化，这不仅使自己的家族获得了蓬勃的发展生机，也为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做出了别具一格的贡献。张教授的论断既深刻又有说服力。他的《家族文化的灿烂奇葩》一文则专论唐兀杨氏的家庭教育，认为它是元代家庭教育的灿烂奇葩。

任崇岳、穆朝庆、李清凌、罗矛昆、许生根、王天顺的大作则以《述善集》、《杨氏家谱》及实地调查资料为依据，论述了河南濮阳西夏遗民的来源、历史变迁、族属及汉化等问题，认为它是中华民族大融合中的典型范例。但由于各人掌握的资料有异，对文献的理解不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遂产生歧异，如对唐兀杨氏的籍贯问题，《述善集》中提到了三个地方，即贺兰山、武威、榆林，由此就产生了

对唐兀杨氏的族属的不同认识，有的认为属于党项（羌）族，有的认为属于蒙古族，有的认为属于汉河西的杨氏，是党项化的汉族。另外，对唐兀间马迁居濮阳的时间也有争议。由于对“大事既定”的理解不同，有的认为在襄樊战役之后就已迁居濮阳，有的认为是在元朝灭南宋之后才来濮阳。还有对皇嗣的理解也有不同，有的认为是指忽必烈，有的认为是指贵由。总之，学术研究有争议是正常的，它可以引导对《述善集》的研究向更深、更高的层次发展。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本文集将这些观点不同的文章一并予以收录，而不以私意偏废，是一种可取的科学态度。

第三组文章数量较多，计有9篇，除白滨教授《元代唐兀氏与西夏遗民》为新作外，其余都已发表过，为了使读者对元代西夏遗民的历史活动、文化概貌、社会地位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本文集有选择地予以收录，这样做对更全面地理解《述善集》的价值，进一步加深对濮阳西夏遗民的研究都是不无裨益的。

这里先说白滨教授的《元代唐兀氏与西夏遗民》一文。文中对元代的唐兀氏、西夏、河西等词含义的异同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探讨，显示出对西夏史研究的深厚功力，通过对河北地区、内蒙古、山西地区、河南地区、山东地区、安徽地区、江浙地区、四川地区以及西藏地区的西夏后裔唐兀氏的徙居、活动情况的分析介绍，极大地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尤其是文中提到了为数丰富的家谱资料，为学术界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这不仅对研究濮阳唐兀氏，即使对研究西夏史，对研究西夏后裔在全国汉化史，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这里不能不提到汤开建撰写的《元代西夏人的政治地位》与《元代西夏人物表》二文。前者将元代西夏人政治势力的发展、政治地位的变化划分为蒙古国时期、元朝前期、元朝中期和元朝后期等四个阶段，分别论述了各个时期西夏人政治地位的升降及其特点。后者则从浩瀚的元明典籍中对元代西夏人物的情况进行了较为全

面的收录，将370多名元代西夏人物列入一表，分列姓氏、爵里、职官、事迹、附录、史料来源数栏，凡有姓氏、有职官或事迹者列入首目，而有姓氏而无官职或事迹者均入附录，资料丰富，考证精确，内容清晰明了，是研究元代西夏遗民案头必备之作。遗憾的是，由于当时《述善集》尚不为学界所知，故本表未能列出任何一位濮阳西夏遗民人物，包括地方志中多有记载的唐兀崇喜其人。《述善集》的出版，将为本表增加数十位元代西夏遗民，其中不少既有姓氏，也有职官和事迹。

此外，李范文《西夏遗民调查记》，史金波、吴峰云《西夏后裔在安徽》，白滨、史金波《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论元代党项人在河西的活动》、邓少琴《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任崇岳《元〈浚州达鲁花赤追封魏郡伯墓碑〉考释》、李培业《西夏皇族后裔考——〈西夏李氏世谱〉研究之一》等都是研究元代西夏遗民的上乘之作，值得参考。但因囿于篇幅与结构（以《述善集》与濮阳西夏遗民研究为主），一些很有价值的论文未能收入文集，显得有些可惜。文末所附杨富学编《〈述善集〉与西夏遗民研究专题论著索引》，可稍补这一缺憾。

本人对西夏、元史都是门外汉。一来是难拒河南大学校友焦进文同志和敦煌研究院杨富学博士的恳切邀请，二来是看到了《述善集》确有可贵的史料价值，因此情不自禁地闯入了西夏史、元史的研究禁区（指自己的研究禁区），滥竽充数地发表了《试论〈述善集〉的学术价值》一文，并为《述善集》两篇原文作注（均见《史学月刊》2000年第4期）。滥竽充数者最怕单独演奏，我的独奏也难免献丑，幸得陈高华先生匡正，方得以补救。现在将拙文和两篇注释稿收入论文集中，也是为订正原有的失误。并以此为戒，今后不再充当滥竽充数者。

总的来说，论文集所收录的文章，其作者都是对西夏史、宋元明史研究有素的学者，因此其论文都具有相当的水平。但是，不论

怎么说，该文集如同《〈述善集〉校注》一样，毕竟是《述善集》研究的初步成果，希望《述善集》公开出版后，能引起专家、学者的重视，写出更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从这个角度讲，称该书校注本与研究文集的出版都是引玉之砖也无不可。

**朱绍侯**

2001年元月16日于维飞书屋

## 序二

1999年春，我应邀赴河南省濮阳县参加了由当地政府文化部门举办的元代唐兀后裔杨姓家族祖藏遗书《述善集》学术讨论会和唐兀公碑揭碑仪式。这是一次具有地方历史文化内涵、群众性的保护历史文物活动。

濮阳县位于河南省的东北部，黄河下游北岸，冀鲁豫三省的交界处。濮阳历史悠久，它是一个拥有5000年古老文明的历史文化名城，上古五帝之一的颛顼曾定都于此，故有“颛顼遗都”之称。又是著名的古战场与历代人文荟萃之地，历史文物古迹遍布全境。1987年在县城内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蚌壳堆塑龙虎图案被誉为“中华第一龙”。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怀抱中的这方沃土也曾被古代少数民族的血汗滋润过。在濮阳县城东古代圣贤柳下惠故里的柳屯镇（柳下屯）杨什八郎村的古金堤南有一处墓地，数座墓冢尚存，墓前神道石碑多已淤埋地下。墓地南部墓前竖立的一方石碑名曰《大元赠敦武校尉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乡人简称《唐兀公碑》，这是当地杨姓族人的祖坟墓地。20世纪80年代初，由碑铭内容引出杨姓族人的祖藏遗书《述善集》的面世，并由此引发了一个中古时期党项羌族所建西夏王朝兴亡、民族融合的话题来。据说当地杨姓居民世代相传都知道他们是元初南征时定居于此地的唐兀公之后，《唐兀公碑》成为族人代代相守、衷心呵护的珍品遗物，每遇战乱、社会动荡和天灾人祸，族人便把碑石埋藏地下，逢太平盛世才使其重见天日。最近的面世当在20世纪80年代之初。进入80年代之后，国家政治上拨乱反正，经济上实行改革开放，党的民族政策深入人心，处处一派繁荣景象。1984年重见天日的《唐兀公

碑》，躲过“文革”的劫难，成为族人寻“根”的依据，他们根据《述善集》和《杨氏宗谱》的记载，认为其祖先既来自元代蒙古族之姓唐兀氏，故希望政府认定和改变其民族成分为蒙古族。此事引起了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重视，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和宁夏社会科学院都相继派专家考察。根据碑铭、文集和宗谱的记载，确认当地杨姓居民正是西夏王朝灭亡后元初被赐姓唐兀氏的西夏遗民后裔。杨姓先祖唐兀公随元朝皇嗣南征，收金破宋，战后携家小居杨什八郎村。这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融合过程的典型，《唐兀公碑》则成为民族融合的实物见证。濮阳杨姓族人尊崇祖先，更尊重历史，欣然接受了这一事实，1985年在政府的支持下杨姓群众集资修建碑亭，以使民族融合的佳话万古流芳。

濮阳县政府与文化部门在保护《唐兀公碑》、发现和保护唐兀家族文献文物方面别具慧眼。1983年县文化部门发现了“文革”中被掩埋的《唐兀公碑》后，遂组织力量进行调查和发掘。1985年4月，县政府发动群众和有关部门集资在杨氏墓地修建碑亭，成立保护小组，加强保护。县文化局又呈报濮阳市文化局和河南省文化厅，1986年11月21日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二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3月修建了永久性的标志。1987年12月26日，县政府与县委宣传部在杨姓族人聚居地的柳屯镇召开了有市、县几十个部门参加的《唐兀公碑》及其附属文物清理保护座谈会。1988年4月1日，濮阳县政府在柳屯镇杨什八郎村召开了“濮阳县文物保护表彰大会”，到会群众与各界代表一万多人，濮阳县政府授予唐兀杨氏家庭“继承先祖遗风，开创今朝文明”锦旗；并在《唐兀公碑》重点保护区树立《保护国家文物懿行碑》，举行了隆重的揭碑仪式。

其后，随着杨姓族人珍藏600余年的祖遗藏书《述善集》的面世，从90年代开始国内各大新闻媒体如《中国文化报》、《河南日报》以及历史文化书刊中都作了报道与介绍。1997年4月24日，濮阳县政府在柳屯镇召开“唐兀氏家乘及《述善集》第一次学术研讨会”，

与会人员高度评价了唐兀公碑及《述善集》的社会、历史和文物价值。同年5月1日，县长何广博撰《唐兀杨氏善行碑记》，刊石勒文，立鉴垂史，以表其行，以彰其德。1999年4月24日，濮阳县政府邀请北京、宁夏、甘肃、河南等地的专家学者共聚濮阳，召开学术讨论会，在杨什八郎村举行了隆重的“复制唐兀公碑揭碑仪式”。在学术讨论会上决定编辑和整理出版《〈述善集〉校注》和《〈述善集〉研究论集》两部著作。在当时县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县长何广博果断表态解决出版费用。现在读者看到的这本论文集就是这次会议前后，由当地杨姓群众、濮阳县各级领导和各地区专家学者共同哺育和耕耘出的一项成果。

书稿既成，因我曾参加过濮阳县的学术讨论会并撰写文章，承濮阳县宣传部焦进文同志之厚谊向我索序。我和焦进文同志是1998年在银川举行的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八届年会上认识的，1999年春我应邀赴濮阳参加学术讨论会后，由相识而相知。看到他是一个为工作尽心尽职、默默耕耘的人，举凡从1983年起保护发掘唐兀公碑，修建碑亭，申报文物保护，拟订保护规划，撰写文稿，筹备会议，陪同考察、参观、来访者，他都安排有绪，事事躬亲。据我所知，1997年他已离开文化局，向省文物厅呈报的《唐兀公碑保护规划》仍由他参与编制。1999年春濮阳会议期间，迎来送往，关照食宿，联系族人，沟通领导，使会议开得圆满成功。在《校注》和《论集》编辑中，除亲自动箸述撰稿外，又八方联系，务实求真，凡此种种，令我感佩，故写序之事义不容辞。在此，我还要再次强调濮阳县保护、弘扬古代民族文化工作的眼光和意义，据我多年在全国各地进行古代民族历史文化的考察经历，全国一些地方类似濮阳县遗存的唐兀碑铭、文集、宗谱，以及尚可追祖认宗延续至今的西夏遗民唐兀后裔族人不在少数，只是未能引起当地族人和有关部门的注意和重视，有的则以误传误，给当地工作造成困难。濮阳县这种尊重科学，发动和引导群众参与，使民族历史文化遗产发扬光大，为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的做法，值得重视和学习。正因为如此，《校注》和《论集》的公开出版是十分有意义的。是为序。

白 漢

2001年3月18日

于劲松之暖墨庐

## 目 录

序一	朱绍侯(1)
序二	白 滨(1)
试论《述善集》的学术价值	朱绍侯(1)
《述善集》学术价值刍议	刘巧云(15)
元代唐兀杨氏《述善集·龙祠乡约》的伦理 学探析	刘坤太(26)
元代西夏遗民《龙祠乡约》探析	杨富学 焦进文(42)
元代哈刺鲁人伯颜宗道新史料	焦进文 杨富学(56)
《述善集》选注(二篇)	朱绍侯(69)
略谈河南省的西夏遗民	任崇岳 穆朝庆(81)
河南省濮阳地区西夏遗民调查	罗矛昆 许生根(90)
党项唐兀氏后裔徙居濮阳的时代背景及 其家族在元代的社会地位	王天顺(108)
从《述善集》看河南濮阳西夏遗民的族属 与汉化	李清凌(115)
杨氏家族婚姻关系刍议 ——《述善集》窥见	张迎胜(125)
家族文化的灿烂奇葩 ——杨氏家族教育刍议	张迎胜(138)
元代唐兀氏与西夏遗民	白 滨(157)

- 西夏遗民调查记 ..... 李范文(182)  
 西夏后裔在安徽 ..... 史金波 吴峰云(218)  
 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 ..... 邓少琴(225)  
 元代西夏人的政治地位 ..... 汤开建(238)  
 元代西夏人物表 ..... 汤开建(266)  
 西夏皇族后裔考  
     ——《西夏李氏世谱》研究之一 ..... 李培业(296)  
 《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考释  
     ——论元代党项人在河西的活动 ..... 白 滨 史金波(308)  
 元《浚州达鲁花赤追封魏郡伯墓碑》考释 ..... 任崇岳(330)  
 《述善集》与西夏遗民研究专题论著索引 ..... 杨富学编(337)  
 编后记 ..... 杨富学(343)

# 试论《述善集》的学术价值

朱绍侯

《述善集》是西夏后裔唐兀崇喜(即杨崇喜)所编的一部文集。这部在民间珍藏600余年的历史文献,共分《善俗》、《育才》、《行实》3卷,卷后附有《伯颜宗道传》。全书虽然仅有40000余字,但对研究西夏后裔唐兀氏迁居濮阳后的社会状况、社会地位及其汉化过程,对研究中华民族的融合史以及相关的其他历史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仅就管见所及,分述于下。

## 一、保存了西夏一支遗民的完整历史资料

唐兀氏本是西夏主体民族党项族的异称。王国维在《鞑靼考》一文中说:“唐古亦即党项之异译。”<sup>①</sup>按唐古即唐兀,亦即党项。《新元史·氏族表》:“唐兀者故西夏国,自赵元昊据河西与宋、金相峙者二百余年,元太祖始平其地,称其部众曰唐兀氏。”如此说来,唐兀氏又成为蒙古人对西夏国遗民的代称。元人吴海在其所著《闻过斋》卷1《王氏家谱序》中又说,西夏为古代羌族,李元昊据河西以为边患,“元初得天下,赐姓唐兀氏”。据此则又说明,唐兀氏是元灭西夏之后,元对西夏遗民的赐姓。以上三种说法虽不同,其实并不矛盾,实际都是对党项的异译而产生的误解,都说明唐兀氏是西夏的后裔。

1227年蒙古军灭西夏,唐兀人绝大多数仍留居故地,成为蒙古统治下的属民,也有很多人先后迁居今安徽、江苏、浙江、江西、四川、山东、河南、河北等地与汉人杂居,还有一部分人随元军南征北战,最后也定居内地。《述善集》的编者唐兀崇喜这一支唐兀人,就